

英译《庄子》研究

徐
来
著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英译《庄子》研究

徐
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译《庄子》研究 / 徐来著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309 - 05938 - 0

I . 英… II . 徐… III . 庄子—研究—英文 IV . B223.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1511 号

英译《庄子》研究

徐 来 著

出版发行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71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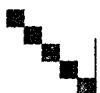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5938 - 0 / B · 288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责任编辑 宋文涛
封面设计 马晓霞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古籍英译研究的新视角	1
第二节 国内古籍英译研究综述	5
第三节 《庄子》英译本概况及其研究现状	7
第四节 本书的目标和方法	11
第二章 《庄子》作为哲学著作的译介	15
第一节 译本对道家产生的时代和哲学背景的分析	16
第二节 译本对老、庄及其著作、思想的评介	21
第三节 译本对《庄子》编订与文本结构的认识	40
第三章 《庄子》基本哲学术语的翻译	46
第一节 “道”的翻译	48
第二节 “天”的翻译	64
第三节 “气”的翻译	74

第四章 《庄子》作为文学著作的译介	84
第一节 译本对《庄子》文学成就的评介	85
第二节 译本对《庄子》文学特点的翻译	95
第三节 《庄子》在英语文学世界	113
第五章 译本：原文本的多种化身	130
第一节 理雅各英译《庄子》	131
第二节 冯友兰英译《庄子》	155
第三节 葛瑞汉英译《庄子》	181
第六章 结语	211
参考文献	21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古籍英译研究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中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翻译研究不再仅仅关注“如何译得对”、“如何译得好”等传统问题,而开始重视一种“描述性”方法:即关心哪些因素制约和决定着翻译的成果;考察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有何种关系;寻找翻译在特定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揭示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这些新的寻求使人们发现了翻译作为“交流方式”的本质特点,领悟到了翻译远远超出“文本转换”之外的多种意义及可能性。用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的话来说:其中贯穿着“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①。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被称为“激动人心”的进展,这一评价并非言过其实——自从“文化转向”发生以后,翻译研究的领域大大发展,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今天,“翻译不仅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且也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众所注目的地步”^②。

①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Routledge, 1996, p. 7.

② 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最近几年,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成为思想界和学术界热衷讨论的话题,其中某些思考已经集聚成著作形式并得以出版,比如,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和《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等著作,即从引用/翻译的角度考察国民性、个人主义等欧洲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产生、理解和使用;赵稀方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也从翻译的视角,考察了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揭示了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宋继杰主编的《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则说明哲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反思西方哲学中的“being”、“metaphysical”等概念的翻译和接受对我国哲学研究的影响。上述种种,均是在文化研究中运用了翻译的视角,并因此发现了以前纯粹的文化研究中所未能发现、未能重视或者未能准确阐释的问题。人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所熟悉并熟练使用的西方名词,如“现代性”、“人道主义”、“女性主义”等,跟西方人所讨论的“Modernism”、“Humanism”、“Feminism”似乎并不完全相同,甚至相差甚远。而要知道其中的偏离起于何时,又是如何形成,则必须追溯到这些概念被翻译的最初状况。

西方文化观念的汉译,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的英译^①,无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英译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中国古籍的英译,从利玛窦(Mathieu Ricci, 1552—1610)等来华耶稣会士就已开始,曾对欧洲文化起过重大影响;19世纪汉学在西方世界兴起后,古

① 事实上,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中国文化的外译,具体来说,也可以细分为中文化的德译、法译等等,但本书只能在其中选一种外语进行仔细的研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外译的一个代表。考虑到欧美各国在语言、文学、文化之间相对邻近的传统,中国文化被译成英语,与中国文化被译成德语,其中出现的问题可能在性质上是类似的。并且,鉴于笔者的外语能力,决定选择中国文化的英译作为分析的对象。

代文化典籍的英译更具目的性和条理性,古籍英译与汉学家的快速成长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以英语世界为例,英国第一代汉学家中的三大星座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第二代汉学家代表人物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第三代汉学家中的佼佼者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白之(Cyril Birch)、韩南(Patric Hanan)、铎比(William Dolby)等,均翻译了大量中国古籍^①。他们的努力不仅使英语世界得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学的最初印象,并且为西方汉学界提供了研究中国的第一批较为方便的资料。国内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包括海外汉学界有关中国思想、文学、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著作,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正是凭藉英译的中国古籍进行的。海外学者把英译文本看作中国文本本身,把中国概念的英译“对等词”^②当作中国概念本身,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作进一步的阐释、研究和应用,其研究的走向与结果,跟所凭藉的英译本面貌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因此,以“文化转向”的视角和“描述性”方法检视中国古籍在西方被翻译、接受和传播的踪迹,显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是儒、道、释三位一体的综合体,其中儒、道二家不但是纯粹的中国本土文化,而且也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两派思想。但正如马祖毅、任荣珍所总结:“如果说 20 世纪以前,中国儒家思想是影响着世界的主要思想的话,那么,到了 19 世纪末,

^① 理雅各翻译了《四书》、《春秋》、《礼记》、《书经》、《孝经》、《诗经》、《易经》、《老子》、《庄子》、《离骚》、《佛国记》等;亚瑟·韦利擅长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译过《诗经》、《楚辞》、唐诗等等;戴维·霍克斯则译过《红楼梦》;白之、韩南翻译并研究中国话本小说,铎比则译了《中国古今八剧》。参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23 页。

^② 所谓的对等词,细究起来,恐怕多数是不对等的。

随着老子、庄子的著作大量的译介，中国的道家思想便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的主要思潮了。”^①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道家主干说”的提法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②。汉学家卜松山 (Karl Heinz Pohl) 指出：“西方接受道家要比儒家晚得多，然而却热烈得多。”^③汉学家陈汉生 (Chad Hansen) 则明确宣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哲学史中，道家的观点更具有意义。”^④可见，在目前的文化环境中，对西方人而言，道家哲学似乎有着较儒家哲学更强的吸引力。黄鸣奋指出：英语世界里有关先秦诸子散文的著译在数量上远过于先秦历史散文。就诸子相比较，儒、道二家备受青睐；若拿儒、道作比较，是道家著作的文学性更引人注目；拿道家中的《老子》、《庄子》相比，又以《庄子》的文学性获得更高的评价^⑤。确实，《庄子》深刻哲学与焕然文采的两重性，不仅在思想上可以代表道家哲学的最高峰，在文学上也是“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⑥。事实上，不管是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认定《庄子》是自己领域的重要作品。而《庄子》这一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代表性文本，从其第一个译本产生的 1881 年到 20 世纪末，共有全译本和节译本十余种，在时间上覆盖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上半期、中期、下半期、末期等各个阶段；译者来自中、英、美各国，其中有外交家、汉学家，也有哲学家。其译本的数量、时间分布、译者国籍与

①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第 28 页。

② “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玉燕、吴德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其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为勤。

③ [德]卜松山《时代精神的玩偶——对西方接受道家思想的评述》，赵妙根译，刘慧儒校，载《哲学研究》1998 年第 7 期，第 36 页。

④ [美]陈汉生 (Chad Hansen)《道家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5 页。

⑤ 黄鸣奋《英语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学林出版社，1997 年，第 106 页。

⑥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第 17 页。

身份等各个方面,都比较适合有条理的分析和研究^①。

因此,笔者拟把《庄子》从 1881 到 2000 年之间一百余年的英译作为对象,通过上述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仔细考察《庄子》的英译历史及译本面貌,了解这一文本在英语世界被接受的轨迹,并试图从文化和文学两方面讨论中国古代典籍英译过程的一些共同现象与问题。

第二节 国内古籍英译研究综述

国内翻译研究界对古籍英译的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开展得还不算深入。中国古籍英译研究方面的专著数量很少,代表性的有许渊冲的《中诗英韵探胜》、汪榕培编著的《比较与翻译》等。前者主要通过大量汉诗英译的实例及分析,展示作者汉诗英译中“音美、形美、意美”以及“与原诗竞争”的追求;后者则通过古籍英译的片断分析,指出古籍英译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希望把中国传统以“准确真实的本来面貌”^②推向世界。总的来说,这两本著作讨论的仍是传统翻译研究中“如何译得好”、“如何译得对”的问题。散见于各类论文集以及报刊杂志的有关古籍英译的论文数量也并不多,以《中国翻译》为例,1990 年至 2005 年十五年间,不足四十篇。而所见的论文,一是讨论的文本对象比较分散,彼此没有联系,显得很随机,可以见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在总体上并无较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二是讨论基本上仍然围绕译文的准确和译笔的优美等问题,可能是由于篇幅的关系,所选取的译例也显得单薄,影响了说服力。总之,这些论文没有集中就某一类古籍英译的问题进行讨论,也没有集中就

^① 这一点,本章第二节的《庄子》英译本介绍部分有详细的介绍。

^② 汪榕培编著《比较与翻译·前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年。

某一文本的若干译本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因此讨论本身虽然很有意义，得出的结论也较可信，但同时也难免零散而缺乏深度。

古籍英译的论文或者译评中，有一类相对集中的论题，那就是试图在译文的“质量”和译者的“国籍”之间寻找必然的联系，并由此推断：古籍英译到底由谁来译更好。有学者认为，“西方汉学家再怎样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他们对中国文字中的内蕴理解总很难透彻。他们用西方人的习惯思维考察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哲学和伦理，就可能有误解。因此，今天为了使中国文化让西方读者分享，就得有新的译本，最好新的译者是中国人，而且应当是学贯中西的中国译者”^①。也有论者宣称“要指望由西方人出钱来弘扬中华文化，那是一厢情愿，万不可能”^②。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而另有学者，如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 1919—1991），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文本的英语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③。事实上，这个“从事汉籍英译的译者资格问题”并不是由国籍说了算的。两派意见所关心的实质，是译者的理解力和表达力，而这两种能力与译者的国籍只有某种相对而非绝对的联系，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还是潘文国的结论比较理性：“汉籍英译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中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勇于承担这一工作。”^④这种提法没有意气用事地比较出外国译者和中国译者孰优孰劣，而是指出中国译者有权利、有能力、也有义务承担这样的重任。事实上，我们国内确实有一批非

① 罗志野《读〈庄子〉新译》，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10期，第49页。

② 转引自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第238页。

③ 转引自潘文国《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载《中国翻译》2004年第3期，第40页。

④ 潘文国《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载《中国翻译》2004年第3期，第43页。

常优秀的古籍英译学者，他们的译作质量非常高。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译本质量的好坏并非决定译本成功与否的唯一因素，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è Lefevere)在他著名的《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指出的“诗学(Poetics)、赞助人(Patronage)、意识形态(Ideology)”^①等因素，在译本的流传和接受方面，有时甚至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这些译本外的因素，正是“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非常重要的考察对象。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古籍英译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笔者掌握的资料不多，不敢妄自判断数量的多少。但就已见到的少量资料而言，似比国内的同类研究更接近文化层面的探讨。以199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有关中国古籍英译的论文集《翻译作为文化阐释的途径》^②(*Interpreting Culture Through Translation*)为例，仅题目就已经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观照的视角，其中的讨论不局限于“是否译得准确”，还从语言、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揭示翻译的难点与局限，并进一步讨论翻译在阐释他文化过程中的意义和影响，试图澄清翻译所不能完全体现或不能准确体现的种种文化本质。

第三节 《庄子》英译本概况^③及其研究现状

早在1881年，巴而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就在上海和香港翻译出版过《南华真经，庄子著作，道家的哲学家》(*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翟理斯把该书跟《庄子》有关的内容整理后，

^① Andrè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② Roger T. Ames, Chan Sin-wai, Mau-sang Ng 主编, *Interpreting Cul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1年。

^③ 包括全译本、选译本，以及其他著述中比较重要的零星篇章或片断的英译。

于 1882 年发表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第 11 期上。据翟理斯和理雅各的评论,这个译本的质量不值得信任。

1889 年,翟理斯出版了《庄子:神秘家、道德家、社会改革者》(*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这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个《庄子》全译本。该译本经过修订,于 1926 年在纽约重版,之后多次重印。翟理斯对庄子道家思想的传译并不十分严密,掺杂了译者本人的西方宗教观念,但是文句比较流畅,在英语世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 1850—1900)和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都受到了此译本的深刻影响,后者甚至据此把《庄子》转译成了德语。冯友兰和林语堂两位中国译者也都承认自己的译本以翟理斯的译本为基础。但是就权威性而言,这一译本远远不及理雅各 1891 年的英译《庄子》(*The Writings of Kwang Zou*)。

理雅各的《庄子》译文同《道德经》译文一起,发表在米勒(Max Müller)主编的系列丛书《东方圣典》中,书名是《道家文本》(*Texts of Taoism*)。该译本除了文本内容的翻译之外,还有详细的前言、注释和索引。理雅各本人在汉学界的崇高威望和他素来追求的“忠实、准确”的译笔,使这部译作成为权威译本,是其后西方《庄子》译者和研究者不可绕过的重要文献。该译本 1959 年重印时,增加了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D. T. Suzuki, 1905—1971)的导言。

1933 年,冯友兰在上海出版了《庄子内篇》英译,该译本 1964 年在纽约再版,1989 年由北京的外文出版社重新出版。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又曾在美国留学和讲学,因此他的译本在英语世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该译本不但译出了内篇的所有内容,还译出了郭象注的部分内容。

1939 年,韦利在伦敦出版了《中国古代的三种思维方式》(*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他在书中译出了《庄子》部分轶事和论辩，直接以译文内容说明庄子的思想，并以此作为道家思想方式的代表。严格来说，这不能算是《庄子》译本，但后来的译者和研究者对他的译文评价都很高，均将他的译文作为重要的参考。

1942年林语堂在《中国与印度的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中，写了《庄子，神秘主义者和幽默家》(*Chuangtse, Mystic and Humorist*)一文，译出了内七篇中除了《人间世》以外的六篇，以及外、杂篇中的《秋水》、《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共十一篇。

同年，Hughes E. R. 在《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中译出了《庄子》部分篇目，名为《自由诗人庄周》(*Chuang Chou, the Poet of Freedom*)。

1960年，华裔学者陈荣捷(Wing-tsit Chan)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了《中国传统资料》(*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他在其中翻译了《庄子》的四篇内容。

1963年，韦尔(James R. Ware)在纽约出版了《庄子故事集》，这是20世纪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台湾文致出版社据此版本于1970年以文言白话、中英对照的形式出版。

1964年，华兹生(Burton Watson)出版了《〈庄子〉读本》，主要包括内篇的翻译；后于1968年出版《〈庄子〉全译》(*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华兹生在翻译《庄子》前已译过《墨子》、《韩非子》、《荀子》等中国诸子散文，因此有丰富的中国古籍英译的经验，加上大量吸收了中外学者最新的《庄子》研究成果，兼顾译文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后英语世界学者研究《庄子》时经常引用和参看这一译本。

1965年，莫顿(Thomas Merton)出版《庄子之道》(*The Way of*

Chuang Tzu),这是根据之前的《庄子》译本所作的拟作,因此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译本^①。

1974年,冯家福(Gia-fa Feng)和简·英格利希(Jane English)合译的《庄子内篇》(*Chuang Tsu: Inner Chapters*)出版^②。

1981年,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出版了《庄子》选译本。译者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安排了译本中篇目、段落的顺序,并删除了部分内容。译者本人认为这一包含原文近五分之四内容的译本,也可以算是《庄子》的全译本。这个译本尤其注重《庄子》哲学思想的分析和呈现,出版后常被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征引。

1994年,Thomas Cleary在他的《道家经典》(*The Taoist Classics*)中译出了《庄子》的部分篇目。

同年,著名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出版了《逍遥于道:庄子的早期道家寓言故事》(*Wandering on the Way: 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1998年重版。该译本自称是“唯一富有诗意”的英译本,出版商在封面上宣称这一译本会成为“权威性的译本”,但国内学者汪榕培等并不如此认为^③。

1997年,David Hinton翻译出版了《庄子内篇》(*Chuang Tzu: the Inner Chapters*)。同年,汪榕培、任秀桦两位国内学者出版了《庄子》(*Zhuang Zi*)全译本^④。由于参考了最新的《庄子》研究成果,加上译者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出色的外语运用能力以及严谨的翻译态度,该译本的质量很高,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好评。但是由于没有在国外出版,因此在海外的普通读者中及汉学界影响可能并不

① 该译本笔者并未亲见。据潘文国提供的信息,该译本是唯一一部全部采用诗体的《庄子》译本。

② 据汪榕培介绍,该译本以简朴的英语和精美的设计吸引了普通的读者。

③ 汪榕培《〈庄子〉十译本述评》,载汪榕培编著《比较与翻译》,第44页。

④ 该译本为英汉对照本,汉译者是秦旭卿、孙雍长。

突出。

1998 年, Sam Hamill 和 J. P. Seaton 翻译出版了《庄子精要》(*The Essential Chuang Tzu*)。

目前国内关于《庄子》英译的研究文章,除了汪榕培的论文《〈庄子〉十译本述评》^①,以及汪榕培、任秀桦的全译本出版后出现的少数几篇译评,几乎未见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②。另外,姚小平、汪榕培等学者有关于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道”英译的研究;张佩瑶、王剑凡等香港学者有对《老子》英译的研究,但这些并不是针对《庄子》英译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在国外汉学界,则有零星的有关道家文本翻译的研究和评论。《庄子》的英译者和研究者之一葛瑞汉就曾专门撰文《道家经典翻译中的两个问题》(*Two Not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aoist Classics*)探讨《老子》、《庄子》的翻译问题。韦利《道及其力量》(*The Way and Its Power*)、爱莲心(Robert E. Allison)《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③、安乐哲的(Roger T. Ames)《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艾兰(Sarah Allan)的《水之德与道之端》等著作中,也多少不等地谈到《庄子》某些概念的翻译问题。

第四节 本书的目标和方法

相比较而言,国内对古代文化典籍英译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反而

^① 载汪榕培《比较与翻译》。

^② 另有华东师范大学 1999 届硕士毕业生黄蕾未公开发表的学位论文《〈庄子〉英译初探》,由潘文国教授指导。该文以多种英译本为基础材料,初步探讨了“道”的英译,以及《庄子》修辞手段的英译。

^③ [美]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周炽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21—159 页。书中第八、九章讨论庄子的思想是否是相对主义,其中指出译者的翻译对读者理解的明显导向问题。